

左明的抗战戏剧创作及其成就

刘 绍 军

左明是我国三十年代著名的戏剧家，电影艺术家，他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首任戏剧系主任，是早期进步戏剧事业的奠基者和革命文艺事业的开拓者。左明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延安、重庆等地，与熊佛西、洪深、田汉、欧阳予倩、周扬、陈白尘、夏衍、宋之的、江上清、陈凝秋、陈明忠、赵铭彝、赵清阁、郑君里、崔嵬、莫耶等一代优秀文艺战士，活跃在文化战线上。他曾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红色话剧团体“五·五”剧社，参与田汉组建南国社，与周扬等创建摩登社；积极组织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无产阶级戏剧运动，戏剧创作蓬勃发展，剧作题材领域扩大。左明的《到明天》、《夜之颤动》与田汉、欧阳予倩、宋之的和夏衍、曹禺等的剧作，都对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作了比较细致的表现；他把农村生活引入戏剧文学领域。从九一八事变到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左明把全身心倾注到抗日救亡运动和戏剧创作里，成为一员抗日文化战线上的猛将。随着“国防戏剧”运动的发展，左明等一代优秀戏剧工作者纷纷创作和演出“国防剧”，抗日的题材成了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重要内容。左明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坚定地走出了自己的路子。这一切，在文化宣传战线上和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斗作用，也为我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1年春，左明积劳成疾。当这位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士手捧周恩来亲自赠送的反乡盘缠，被搀扶上重庆驶往汉中的汽车时，他落泪了：“只要我不死，决不辜负周公（当年在重庆，大家对周恩来的尊称）的情义！”孰料，这竟是这员“名将”与周公、与老大（田汉）诸战友的最后诀别，成为民族的巨大损失。

左明为民族解放事业奋勇战斗，直到生命临终一刻，还落笔在《爱国一片心》的最后一幕的稿纸上。未完成的剧作，未听见抗战胜利的炮声，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他矢志奋斗的事业。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探讨这位爱国文化战士的抗战戏剧创作及其成就，有现实意义，也是对烈士的纪念。

—

左明集编、导、演于一身，在他短暂的一生，创作电影作品十余部，戏剧作品众多。但能够流传下来为我们搜集到的剧本却为数不多了。仅就我们能见到的几部戏剧作品，都充分显示了唤起民众，宣传抗日的重要作用，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曾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不能忘记，当年左明的剧作和演出风行全国，对民族解放大业所做的贡献，为

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的汗马功劳。左明的作品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戏剧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放下你的鞭子》就是这样不朽的作品。

这是一个篇幅不长的街头剧，按现在的说法亦可称之为广场艺术、广场剧，剧本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后，失去亲人家园，背井离乡，流亡到关内的爷孙俩沿街卖唱乞讨的悲惨情景的描写，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屠杀我同胞的滔天罪行，鞭鞑了国民党“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放狼入室的恶果，有力地表现了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同仇敌忾，誓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决心。就像张寒暄的《松花江上》张曙的《抗敌》歌一样，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年代，它们这对戏剧、音乐姊妹花家喻户晓，像周恩来同志称赞的那样“给全面抗战起了伟大的推动作用，”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左明和张寒暄二十年代在北京艺专时，曾同在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是左明抗战戏剧创作的重大收获，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是成功的，具有不可忽视的创新的现实意义和现实意义。

《放下你的鞭子》一剧充分体现了左明“我们的戏剧运动当然不是他们的戏剧运动。更不是戏馆里的老板专门赚钱为目的的戏剧运动”这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观。社会效益在这里摆在了首要地位。剧作短小精悍，剧情线条简洁明晰，人物极少。但左明新颖独特的巧妙构思安排，不仅增大了剧作的时空和内涵，而且调动了街头、广场千百观众群众的直接参与，爆发出轰动效应，这也是左明“民众戏剧”思想的实践体现。他将□汉上演过的《迷娘》一戏整理出来，用他“与群众打成一片”的设计构思，终于使《放》剧达到了政治与艺术和谐统一的完美地步；特别是观众的真接参与，应该是今天话剧舞台不景气的情况下，在上海、北京等地出现的一些“室内剧”强调“与观众直接交流”，“调动观众参与”的文化渊源，值得戏剧工作者借鉴、发展，并能够有所突破。

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当时笔者还是中学生的時候，一次，在北京宝禅寺崔嵬先生家里，适逢赵丹、徐韬等导演、明星在崔嵬家做客，崔嵬知道我是汉中人，便提起了左明的一些事，询问左明家的情况。可是我竟不知道自己家乡陕西汉中还出过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当时，赵丹说他们和白杨、张平等曾都是左明的学生哩！当时，我的崇敬和由于无知的羞惭，至今仍在心头。曾与左明在延安鲁艺共事的崔嵬先生还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去上海的一件事。那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他和张瑞芳录音——《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抗战初期，他曾与张瑞芳同志演出过。现在战友相逢，当年情景历历在目。张瑞芳饰卖艺的姑娘，她真挚的感情和动人的表演，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扉；崔嵬饰卖艺老汉，演到老汉哭诉自己流亡的痛苦和为了吃饭不得不鞭打自己的女儿，全场观众不禁悲愤交加，这时场内和场外之间，演员和观众之间，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全场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宁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其场面之感人肺腑，影响之深远广大，在中国戏剧史上罕见。当录完音后，他和张瑞芳同志竟失声地抱头痛哭不止。

是的，历史证明那些植根于生活沃土之中，并且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是不朽的！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八·一三”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燃烧到大上海，上海文化界紧急动员起来，左明参加发起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进步影剧界人士意气风发，组成了十三支救亡演剧队，肩负起抗战宣传的重任，纷纷奔赴前后方演出，宣传抗战。

左明为第五演剧队队长。1937年冬，他与由洪深、金山率领的第二演剧队等在开封会师后，决定继续西进，先后经江、浙、豫、皖、陕公演后，率队去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开始了戏剧家又一创作时期。这期间，左明除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和教学工作之外，他导演了《农村曲》和《血祭大上海》等大型话剧，文学创作也非常活跃。这主要是发表在著名作家赵清阁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上的《王八旦才逃》（1卷4期）、《军火船》（1卷6期）、《大义灭亲》（3卷3期）、《神枪手》（3卷8期）等独幕剧本。至41年剧作家去世前，他创作的《中国进行曲》、《爱国一片心》等多幕剧本，是很难找到踪迹了。短短几年间创作了数部剧作，由此可见，左明尽管没有投身烽火前沿，却勤奋地以笔代枪，参加了抗日战斗，成为无愧的民族解放战士。

《王八旦才逃》这出戏，作家把喜剧形式下掩盖的悲剧内容描绘出来，喜剧的调子中蕴含着讽刺的力量；悲怆的调子中有着民族的一股排山倒海的气势。由于远在芦沟桥抗敌前线的新郎不能如约回家拜堂，而要由妹妹阿英替哥哥与新嫂子拜天地时，人们对制造这扭曲的生活，颠倒的天地之罪魁祸首日本帝国主义，憎恨与愤怒之情油然而生。当新郎阿义为保护新娘免遭日寇侮辱而倒在日寇枪口下时，新娘郁结的痛苦和仇恨冲出来了；当人们拿上锄头、镰刀、斧头、剪子、菜刀，甲长也跟了上去，李二嫂操起堂屋那对龙凤烛的铜盏台时，她们内心的积怨和仇恨象火山喷发一般，冲向日本鬼子，“那怕流尽我们中华民族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与敌人抗争到底的，我们只有抱着必死的决心，我们才能从死里夺回我们的生存！”这铿锵的声音震撼人心。人物的成功塑造，产生了撼人的力量。阿龙和甲长的矛盾冲突和解决，不仅反映了当时国统区后方人民的生活真实，也高度地概括了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矛盾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表现，这画龙点睛的一笔也是值得称颂的。全民总动员起来参加抗战，有国才有家，有了民族的解放，才可能有个人的幸福，成为《王》剧的主题。还值得称道的是，这出戏的民族风格，尽管只是一部短剧，但无论是刻划冲突，描绘人物，渲染气氛，都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乡土特色。

独幕剧《大义灭亲》的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则较为复杂。这是一个家庭悲剧故事，正像恩格斯说的，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大义灭亲》正是以现实主义笔触，透过家庭悲剧，揭示出人们在社会变动中的精神历程。宋珍是流亡关内的一位深明大义的善良母亲，她带着三个孩子，饱尝了流亡的痛苦和心酸，顽强地活着，而把丈夫受日本侵略者利用最终成为汉奸带给她的屈辱和眼泪埋在心底。历年的艰辛，带大了儿女，无疑是母亲的喜悦。然而，孩子们随着时代成长起来的思想，给母亲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心理矛盾，从而深化了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使汉奸父亲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作品透过血缘关系的纱帷，令人看到的是更典型、更复

杂的阶级关系。在这里，亲子关系没有掩盖阶级的对立，而表现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冲突。儿子从新所代表的是全民族的利益，那就是“对于出卖民族出卖国家出卖自己人格的汉奸，绝没有可原谅的”！这一形象在剧中的出现，使《大义灭亲》的现实主义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给作品的主题注入了新的阶级内容。尽管这个形象不够丰厚，却加强了作品的悲剧分量。剧中人物心灵撞击的残酷，是作家把日常生活中阶级压迫的残忍和冷酷戏剧化了。剧作收尾有力，震荡观众的心扉，令人沉思、回味。尤为深刻之处，是作家从这个小小家庭震荡崩溃图景中，揭示着生活发展的趋势，展示着生活发展的逻辑力量。不难看出，作家在延安时期思想更加趋于成熟。

《军火船》也是一个独幕剧，虽然同是抗战内容，却一反左明题材取向，描写了一场夺取日寇军火的紧张战斗。战争生活对左明来说是不太熟悉的，谈不上深刻的体验。但作家没有直接描写战争场面，而是通过游击队包围并机智的夺取日寇一船军火的斗争来展现主题。在这里作家构思得当，使得这场发生在黄浦江码头上的斗争恶浪寓寂静之中翻滚；紧张惊险寓抒情之中发展，情节引人入胜。尽管是一场战斗小戏，作家注意了人物刻划，妓女（游击队员）和警察形象的塑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不是你个人的父母姊妹被屠杀的问题，而是千百万中国同胞的父母姊妹被屠杀的问题，你懂吗？”“你知道亡国奴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吗？”警察回答女游击队员“我知道，我们同队的老乡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们一听见这三个字差不多就要哭出来的”。特定的时空，作者营造起的特定情景氛围，使得这些类似政治说教的语言，却能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崩发出时代的火花而引起共鸣。更为可贵的是作家直接描写了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敌后游击队斗争风貌，工人形象的出现，诗意地概括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正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敌人四面楚歌，漫画式的描写了他们的疯狂与恐惧。表现了作家对抗日战争必胜无疑的坚定信念和期待，这也是抗日战争历史进程的必然。这些都是作家在延安创作时期的新收获。

三

当我们在研究左明剧作和他的艺术创作道路时，不难发现他和我国戏剧改革运动的前驱者、戏剧文学家、革命文艺的开拓者、组织者田汉在事业上交织在一起。在田汉的戏剧文学创作中，如果把他1929年以前算作前期的话，这也正好适合左明的戏剧创作生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时期，剧作家队伍迅速扩大，除了欧阳予倩、洪深、田汉、熊佛西、谷剑尘等人在剧本创作上有新的突破之外，戏剧队伍又增添了曹禺、夏衍、宋之的、于伶、陈白尘、李健吾、白薇、楼适夷、阿英等新秀，左明就在这批新秀之中。他描写工人阶级斗争生活的独幕剧《到明天》、《夜之颤动》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而他大部精力是“协助田汉在剧本创作和舞台演出方面的工作”。“他差不多像田汉先生的左右手，田先生时常把他构思的一些戏剧情节和左明摆谈，听取他的反映和建议，左明也喜欢开门见山地出谋献策。田先生这一时期的剧本创作和演出设计，例如《名优之死》、《湖上的悲剧》以及《一致》等，在场面、人物、语言各方面，左明实际是一个剧作参加者”。这个时期，田汉的思想还属于民主主义范畴，此后，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田汉的创作由最初带有不同程度感伤情调的浪漫主义倾向到“渐趋明确的反抗”，

这些对左明的戏剧创作不能不有所影响。然而，此时作为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早期共产党人左明，公开表明自己关于“民众戏剧”的思想，他说：“戏剧在艺术中是最民众的艺术了，它的起源也是由民众而起的，后来落在帝王的手里，再后又落在资本家手里。直到今日，戏剧真不知成了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做戏剧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将被强暴劫夺跑了摧残了的戏剧，将它救起来仍旧还给民众”。这些思想对田汉的戏剧改革运动和创作思想，也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与田汉“摆脱感伤情调，倾向于现实主义，直接紧密地结合了政治斗争”是密切相关的。

1930年后的“左联”时期，党领导文艺战线的斗争，左明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戏剧演出和电影编导方面，展现了他集编、导、演于一身在戏剧和电影艺术创作中的才华，电影作品颇丰。戏剧演出中，左明对人物塑造上的表演技巧精益求精趋于成熟。1981年，陈明忠先生回忆：1935年左明饰《钦差大臣》中的小丑仆人一角。此剧初演请鲁迅先生看戏，事后鲁迅先生托人带来了意见，其中之一即对仆人这个人物特征说：“傻而自做聪明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人物，演得太机灵，不符合原著的精神”。左明听了非常激动，感到这个宝贵意见必须深入体会，他和执行导演、他的老同学章氓认真仔细研究，再三排演，后来演出成功，完美地塑造了一个“傻而自作聪明”的仆人形象。陈先生说：“现在想起来，好像这个人物还活跃在我的眼前”。田汉1957年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关于“名优之死”》一文中，不无自豪地写到：“《名优之死》……最初演名优的是洪深，演左宝奎的是后来在延安导演《血祭大上海》的左明同志”。仅此，亦可看出左明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和造诣。

七七事变后和延安时期，是左明戏剧文学创作非常活跃的时期，短短三、四年他创作了不少独幕剧、多幕剧。1936年，随着“国防戏剧”运动的发展，新老剧作家纷纷创作“国防剧”，抗日的题材成为戏剧文学的重要内容。田汉、于伶、夏衍等名家均有一批佳作问世。戏剧特有的宣传、鼓动作用，适应了当时历史的要求，剧作家们借助于戏剧这一形式唤起了更多的人的觉醒，顺应了抗日斗争的需求。在党的领导下，左明和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团结战斗，积极倡导组织推动，“左翼剧联”开展了无产阶级戏剧运动。戏剧运动推动了演出，舞台演出又推动了剧本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在左明上述剧作中，语言简洁易懂，即是没有文化的人也能听得明白真切。当然有的失之含蓄，少些令人咀嚼的余味。但是，我们认为正是剧中台词的直白形成的呐喊风格，是时代的需要。

“政府，他不需要戏剧，需要戏剧的是民众。资本家也不需戏剧，他只需要消遣，需要下流的玩意儿。在这年头儿，资本家高于一切，他需要什么，当然有人会变本加厉地供给他，在这里用不着再来说什么”，“我们赶快联合起来，努力向同一目标做去！黑暗已经在束装了，光明还会远么？”左明这呐喊不也是历史给现实敲响的钟声么？

左明以自己在戏剧文学、电影创作领域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卓越才能，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把自己的创作和人民的命运、民族的解放和祖国兴衰紧紧连在一起。在抗战中，他更是杀向敌营的战将！他的作品是时代的战鼓，唤起中华民族奋勇向前；他的作品犹如发向敌阵的炮弹，为民族解放战争呼啸呐喊！这些都成为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左明把自己的青春和短促的生命全部贡献给了祖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